
论制举与唐代隐逸风尚的关系^{*}

查正贤

内容提要 唐代帝后经常以制举的方式征辟人材。这是一项因应常举的某些不足而实行的重要制度。为制举而颁布的诏书借助传统的隐逸话语,并灵活设置各种科目,把应举士人命名为沉沦草泽、待时而出的隐逸之士,从而塑造了唐人的隐逸意识,直接鼓励了士人把自身多个阶段的经历描述为隐逸生活。制举所塑造的隐逸意识及这一塑造活动本身,都是唐代隐逸风尚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它的独特面貌,不宜简单视为“假隐”。同时,帝王对其考试程序的灵活运用,使之能在实践层面上具体落实这一关系,并随着前后社会情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从而进一步充实了它与隐逸风尚的关系。

关键词 制举 隐逸 唐代

唐代隐逸风气盛行,与文学创作关系相当密切,故长期受到学界关注,至今也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帝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是这类问题之一。传统社会里,隐逸始终与王权脱不了干系,即使士人的主动退隐,也仍然是以拒绝的方式呈现了这一特定关联。因此,无论哪一个朝代,帝王的态度都天然成为认识其隐逸现象的重要视角。对唐代而言同样如此。《旧唐书·隐逸传》里关于“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的记载,以及“嵩少捷径”的价值判断^①,就一直指引着人们强调帝王的征隐在唐代隐逸风气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应该说,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略加斟酌,便可发现它提供的解释又非常不充分。实际上,出于激贪励俗的目的而征辟隐士,历代都奉行不辍。唐室帝王的类似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促成比前代更加普遍的、具有唐代特色的隐逸风气,还有待细致辨析。某种意义上说,直接从帝王的征隐推知其时隐逸风气的状况,仍属自发的印象,还需要通过细致的研究形成自觉的认识。本文认为,与传统的征隐相比,自唐初即开始实行、与征隐行为类似但有很大不同的制举制度,在唐代隐逸风尚的发展中所起的独特作用更值得注意。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些讨论。

—

制举在高祖初年就已实行,学界已有定论^②。需要指出的是,有迹象表明,唐初实行制举,一开始就与士人的退隐之风有密切的关系。

隋末唐初社会动荡,士阶层出于对王朝更迭的本能反应,一方面积极事功,参与到新王朝的建设之中;另一方面,也有相当多的士人退归林下,社会上出现了规模颇大的归隐之风。例如张道源,“隋

*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审读并对拙作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本文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B404)的成果。

① 《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序》,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第5116页。

② 徐松《登科记考》据武德五年三月诏认为制举始于本年(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一,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傅璇琮依两《唐书·崔仁师传》,指出武德初就已实施(《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孟二冬又据两《唐书》补充田仁会武德初应制举之例证(《登科记考补正》卷一,第1页)。

末政乱，辞监察御史，归闾里”^①。又如王宣，隋授建节尉，加上仪同三司、朝散大夫、右监门校尉，隋末不仕，“匿影周南，叹息铜驼，徘徊白社，萧然自得”。张伽，“隋以平辽功，授建节尉，俄迁朝散大夫。隋运告终……追何石之高踪，慕嵇阮之雅致，埋轮不仕，脱落人间”。董师，“隋上开府仪同三司，唐兴，景命以维新，君逸志林泉，忘情簪绂”^②。面对士人这种惯性反应，帝王自然也会援引历史惯例，以征隐的方式适当地加以殊礼，以稳定、羁縻士心。尤其是这些士人中，有的曾仕于隋，有的原是品官之子，王朝更迭使其利益都受到程度不一的损害，以致常有不满情绪。如盖蕃随时为尧台府司马，“及皇唐以威灵畅于东夏，以隋官降授文林郎，从时例也。府君以为遭天人革命之秋，君子经纶之会，而栖附非地，沉于散冗，岂命也乎。遂安之无复宦情，唯以讲授为事”^③。对于新王朝而言，是一股潜在的离心力量，需要在适当的时候以禄位加以收束。最有效的方式便是来自新朝的辟命。是以唐室在政权初步稳定之后，“送故之情既毕，惟新之命口隆”^④，对这些士人或授以实职，或辟以散官。如房基，随时以荫资入太学，“策应甲科，授宣议郎”，“奸雄竞起，口沮溺之志，尚夷齐之志，贞观元年，授右仓曹，袭饶阳男”^⑤。又如禹艺，大业中擢第兼荫资，“为武安丞，俄转东宫。时逢道丧，闲居洛浹，守潘岳之清尘；瞻顾箕颍，挹许由之隐逸。大唐启化，仄陋扬明，乃以隋资，辟散官”^⑥。

但唐初对这些退隐士人的征辟，又远非单纯的遵行前代故事，为新朝装点门面。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旌赏一两个隐士，而是因应现实的需要，拔举人材充实人员匮乏的官僚队伍。史籍明言唐初立国官吏相当缺乏，《新唐书》云：

武德中，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有司移符州县，课人赴调，远方或赐衣续食，犹辞不行。至则授用，无所黜退。^⑦

“课人赴调”、“无所黜退”应包括在任官的迁除情形在内，但“士不求禄”又说明其对象又不限于在任官，也包括退隐之士。如此急切地征求士人任职，在今天尚能找到一些具体的例子。如杨昭，其父杨林为“隋宗室、大都督”，杨昭在随时“任散员外郎”，“丘园养望，取乐陶如。唐受命，搜简不遗，才为时须，自隐无术。梁公初建府僚，为登仕郎兼府长史”^⑧。“才为时须，自隐无术”之语与新《书》合观，可知在墓志的惯用谀词之外，也的确透露出形势的紧迫。

面对这一形势，唐初采取了多种措施。制举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种。作为一项拔举人材的制度，史家早已指出制举与汉代察举制度之间的承继关系。这是不错的，但这只是表面相似。唐室帝王面临的完全是新的社会情势。要注意的是，新朝建立时由于士人不求仕进导致吏员不足的问题如此突出，在此之前极少见到。其原因是，隋朝将地方州县属官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所有胥吏之外的品官都由中央选派^⑨，导致大乱后因士人流散而产生的大量空缺要由中央在短时间内补充。这是前代所没有过的现象。常举虽随时已实行，便于遵依，但其秀才、进士、明经科目规定了应举者要先习艺业，仓促之间

① 《新唐书》卷一九一《忠义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第5503页。

② 王宣，隋文帝开皇六年生，唐高宗麟德二年卒（586—665），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以下简称《汇编》）麟德〇六四。张伽，卒于唐高宗显庆二年（657），《汇编》显庆〇三〇；董师，隋文帝开皇九年生，卒于唐高宗麟德二年（589—665），《汇编》乾封〇〇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除张伽不知生年，无法考知唐初退隐时之年岁外，王宣、董师在隋唐之际均不过三十岁左右，这很能说明问题。

③ 见《汇编》咸亨〇一五。

④ 《汇编》麟德〇二二。志主罗端，麟德元年（664）卒，年七十九，隋末唐初年三十余。

⑤ 房基，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卒于唐高宗永徽五年（594—654），《汇编》永徽一二三。

⑥ 禹艺，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卒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593—649），《汇编》贞观一六八。

⑦ 《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第1174页。

⑧ 杨昭，卒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汇编》贞观一六五。

⑨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校点本，第792页。

难以敷求^①，这应是高祖远袭汉法，先行制举的重要原因。

这一人事制度变革的实质在于，它从制度上规定，只有从帝王那里获得资格的士人才能步入仕途。这就把所有士人的前途都直接固着在帝王的一命之上。它带来的后果是，帝王以固定的考试制度、荫子制度持续地赋予士人以出身，激发了士人对皇权德泽的体认及进取的意愿。同时这也意味着官僚系统所有成员的通塞问题也要由帝王亲自负责（当然，实际上是常由最高中枢机构出面执行）。以后的历史表明，这成为唐代社会的一个痼疾。易代之际带来的上述问题，只是其初起时以反面形式出现的苗头，此后的问题与唐初完全相反，不是吏不充员，而是员阙永远不敷需求。这迫使官僚体制不断进行各种调整。制举便是由帝王出面进行调整的重要措施，并因此而与唐人的隐逸观念结下特定的关系。

高祖时制举仍属初创，可供详考其情的文献不多，但仅从目前可见材料而言，已可看出它基本确立了以后三百年之制的基本性质和特征。现存最早的制举诏是武德五年三月的，诏云：

择善任能，救民之要术；推贤进士，奉上之良规。自古哲王，弘风阐教，设官分职，惟才是与。然而岩穴幽居，草莱僻陋，披褐怀珠，无因自达。实资选众之举，固藉左右之容。义在搜扬，理宜精擢。是以贡士有适，爰致加锡之荣；无益于时，必貶贬黜之咎。末叶浇伪，名实乖乖，取非其人，滥居班秩。流品所以未穆，庶职于是隳废。朕膺图御宇，宁济兆民，思得贤能，用清治本。招选之道，宜革前弊；惩劝之方，式加恒典。苟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己登朝，无嫌自进。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举，陈其艺能，当加赏擢，授以不次。^②

虽然没有明言考试，但“陈其艺能”至少是类似于一道考试程序，故制举必备的考试程序，可以说也是在此时就已确立。荐举与自举相结合，重视艺能的考核，并明允不次授职，这些是三百年制举的基本特征。但这些还只是显性的制度条文，不难辨认出来。更值得注意的是诏书里“岩穴幽居，草莱僻陋，披褐怀珠”等语。这是对卷怀深藏之士的习称，并为以后唐室诸帝所遵行。通检此后的制举诏，多首先在诏书的开头饰以类似用语。如贞观十五年因拟于次年东封泰山，下诏举人，中云：

朕冕旒夙夜，虚心政道。虽天地效祉，宗社降灵，区宇晏如，俊乂咸事。尚恐山林薮泽藏荆隋之宝，卜筑屠钓温萧张之奇。……临河渭而伫英杰，眺箕颍而怀隐沦……^③

高宗显庆元年诏云：

比年虽尝进举，遂无英俊。犹恐栖岩穴而韬奇，乐丘园而晦影。^④

武后永昌元年诏开八科举，诏云：

虽复群龙在位，振鹭充庭，仍恐屠钓或违，~~莛~~轴尚隐。未殚岩穴之美，或委丘园之秀。所以屡回旌帛，频遣搜扬。^⑤

玄宗更在考试举人前用此类典型用语来面谕制举人：

① 徐松据《唐摭言》引武德四年开科举诏云：“诸州学生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是科举首先要有精习艺业之应举者。武德元年已诏设各级学校，至四年或认为生员学业有成，可以应试，故诏开科举。单行本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诏文与徐松所引略有差异，首云“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卷一“统序科第”条，第1页。又卷一五“杂记”作“四月十一日”，第159页），“早有”一语，似还指在隋时就已是明经、秀才、俊士之类的生员，则高祖又深知学业有成并不容易，前代生员可以暂充其选。

②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18页。

③ 《登科记考补正》卷一，第23页。徐松《登科记考》已将有关唐代科举相关文献收集殆尽，本文一般依据其所收录之材料，庶不攘前贤之功。

④ 《登科记考补正》卷二，第50页。

⑤ 《登科记考补正》卷三，第105页。

朕恭默思道，寤寐劳求，长想幽仄，屡申旌贲。……卿等……来应旌招，深副虚伫。^①仅从外表看，似乎只是虚文套语。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仕途的沉滞通达天然地就与隐逸的系列话语相关。当它更直接、更紧密地与帝王联系在一起时，这些话语自然就成为帝王界定其举措合理性的资源。尽管应制举的士人是以各种身份辐辏于辇毂之下的，其中不乏现任官，从字面意义上，他们并不全是“隐士”。但是，以“旌贲丘园”的名义开头的制举诏书，却把他们总括在“隐逸”的总名之下。实际上，制举诏的颁布是帝王为这些身份庞杂的士人所举行的锡名仪式。其含义是，通过把自己的行为命名为旌贲隐士，帝王确认了自己正是仄席求贤的明主；与此相应，也把目标中的士人宣布为隐逸之士，以名实相副。这是传统征隐时的典范用语出现在制举诏书中的根本原因。

因此，制举诏中的这些用语，不是对某种“隐逸事实”作真伪鉴定，而是通过“命名”产生“事实”。帝王的无上权威足以使这一命名产生实际效力：由搜访隐逸之诏所招来的这些士人就是怀才未达的隐逸之士，他们就构成了一个隐逸群体。有唐一代的制举，首先就是以此种方式塑造了士林的隐逸意识。同时，这种塑造行为本身也是隐逸现象的一部分。

二

制举诏把目标中的士人命名为隐逸之士，从而对士林的隐逸意识起到重要的塑造作用，还可以从它与常举的关系以及其内部科目的设置中得到进一步的认识。

制举是与常举相对而行的。从两者的实际运作情形可以看到，它们实质上是用不同的观念来看待天下的士人^②。常举是纯粹赋予士人出身的制度，它以范围明确、固定的艺业为考核内容，及第的标准和等第也有清晰的条文。对负责实施常举的各级有司而言，这是它们的日常工作，只需按部就班地进行，无需特地为它的运作提供理由。相反，只有在它不按常例举行的时候，才需要帝王出面说明原因，如战乱未平权宜停举等。走此途的士人必须是白身，或者放弃荫资，通过各级官学以生徒身份应举，即使乡贡，也需经过州府的考试后赴举，有时甚至还须补两监生后方可获荐^③。这决定了它是一种以均等化为根本特征的制度。应举资格的均等化和考核标准的均等化实际上暗示了，那些努力使自己符合其标准来应举的士人，实际上不过是为高张的条格预先允诺的利禄所驱使，是主动营求、汲汲于富贵功名的人。他们年复一年地涌现出来，司空见惯，不必也不可能选拔之前就普遍地给予他们特别的荣誉。用以指称有司这一日常工作的“进士”、“贡士”，便可直接用来称呼走此途的士人，无烦另外的命名^④。甚至这一名号也常常被轻慢，因为赋予他们这一名号的仪式经常废而不行，以致往往要帝王特令每年冬天要认真举行乡饮礼以送各地的进士赴京^⑤。对走在这条路上的士人而言，他们在声誉

① 此为开元九年事（《登科记考补正》卷七，第255页）。

② 有荫可资且愿意走此途的士人可以认为属此范围之外，但对本文的讨论无实质性影响。

③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繇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第1161页）王定保谓“贞元已前，两监之外，亦颇重郡府学生，然其时亦由乡里所升，直补监生而已”（《唐摭言》卷一“乡贡”，第6页）。两处记载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即既有士人直接由乡贡应试，也有补两监生后再应试者，不过风尚转移，时有偏向而已。所以王定保又云“永徽之后，文儒亨达，不由两监者稀矣。于时场籍，先两监而后乡贡”（《唐摭言》卷一“论曰”，第10页）。而开、天之际，举子以京兆、同、华等畿甸之地解送为利市，轻入学，以至玄宗一度于天宝十二载下诏停乡贡，所有应举者非由国子及地方学校皆不得举送（《新唐书》卷四四，第1164页）。

④ 在传统的政治语境中，“进士”、“贡士”就已经是相当高的荣誉称号。唐代常举将仅仅通过了州府或官学推择的士子称为“进士”，明清以后则只用以称呼及第者，相比之下，唐代给予的荣誉要高不少。但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它又只是一个相当普通的称号。

⑤ 如睿宗改元景云的前一天（即唐隆元年）下制：“乡饮之礼，废日已久，宜令诸州每年遵行乡饮之礼。”（《登科记考补正》卷四，第180页）

和实际利益上的巨大收获,更主要地是在获得出身之后。在此之前,这一制度本身除了考试过程的公允与否外,并不对他们承诺额外的责任。落第一般只能归因于士人自己艺业不精。获得出身之后的仕途问题,则又很快被转移到吏部,通达沉滞,是吏部铨选的责任。士人抱怨其应举时为小吏所呵使的屈辱,正说明这一制度潜藏的对士人并不着意尊重的态度。

制举则不同。它的科目繁多,这个明显的特征久为人所注意,今天的研究者还尝试根据典籍整理过相当详细的清单^①。不过,对制举广设科目的意义,还可再讨论。不同的科目针对不同身份和才能品行的士人而设,这些士人包括无出身者及有出身而未任职者,还有在任或前资官。很显然,他们共时分布在不同的社会空间里。但同时,这些不同空间里的士人却又隐喻性地构成了一个士人在其一生中所能经历的完整的道路^②。也就是说,与常举只涉及刚开始其人生的士人不同,制举的力量无往不屈,对处于仕途各个阶段的士人都可施加影响,许多士人一生连应制举,就说明这一点。这就不是设官分职的某个单一省部能做得到了,只能由帝王出面。同时,也必须为这一做法给予一个合适的名分。在传统语境中,显然只有“旌贲隐逸”之类用语才最合适。应制举的士人所受的对待,明显优于常举士人。给予优待的方式,除了可能更好的起家方式,考前帝王的召见与赐食,考试时帝王的亲临、亲问更是远非常举所能及^③。值得指出的是,帝王的召见,正是在他们是旌贲而来的怀才隐逸之士这一名义下进行的。这既说明了帝王对制举选拔士人的重视,更说明帝王对以这一名义进行此一选拔工作的重视。

在“旌贲隐逸”这一总的名义之下设立的科目,可以观察到有两种类别。第一类是那些明白规定了具体才干和品德的科目,如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等。第二类是诸如“幽素”、“销声幽薺”、“高蹈丘园”乃至中唐以后出现的“处士”、“山人”^④之类的科目。这一类科目的特征在于并不规定实质的才艺要求,只是以描述应举者生活状态的方式来确定其资格问题。例如“销声幽薺”或“幽素”科,仅指目前未见用于世,对其为何不见用则置而不问。这样一来,士人主动采取的行为与本属其人生某一阶段的正常经历被等同视之,其间的重要差别匿而不彰。如《云麓漫钞》记显庆四年科目,有“洞晓章程”、“材称栋梁,志标忠鲠”、“政均卓鲁,字俗之化通高”、“安心畎亩,力田之业夙彰”、“道德资身,乡闾共挹”、“养志丘园,嘉遁之风载远”、“材堪应募”、“学综古今”,共八科^⑤。像“洞晓章程”之类,就有具体的内容或标准,“养志丘园,嘉遁之风载远”则仅从外在的行为而论,并不涉及为何“养志丘园”。

由这两类科目构成的制举的运作过程值得剖析。这些科目并非如诏书字面上所示的平面罗列关系,而是在实际运作中形成了一种自反性的结构体系。这一结构中,前一类只能由相应资格的士人应荐,它们含义明晰,界限清楚,便于推荐者和应举者对号入座。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常举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后一类则留有很大的模糊空间,与前一类科目所范围的人选有相当的重叠,甚至几乎覆盖了前者。也就是说,制举一方面以差异化的科目有选择性地选拔士人,另一方面却又用泯灭差异的科目消解了前一类科目在身份、资格上的差异化设置,对前者起到了明显的调节作用。如果说,某种程度上,制举可以视为从掌常举和常选的有司手中争夺士人,则“幽素”、“高蹈丘园”一类的科目得在制举内部与“贤良方正”之类科目展开了另一场争夺。制举这种自我调节的内部机制,最终将使所有的士人都能成

① 例如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138页。

② 应限于士人出选门之前,即六品以下。五品以上不在吏部铨选之列,故不在制举范围内。刘祥道显庆三年建议荐举秀才,也是“望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纶言,更审搜访”(《旧唐书》卷八一《刘祥道传》,第2752页)。

③ 每年冬赴京应举的士人,因左拾遗刘承庆之奏,才于长寿三年献岁元会开始列在各地所贡方物之前(《通典》卷一五《选举三》,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54页。《唐会要》卷七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8页)。

④ 赵彦卫《云麓漫钞》记有“处士”、“山人”、“学究《周易》处士”等科,注明分别在元和十五年、长庆二年、大和二年(卷六,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2—103页)。“学究《周易》处士”科《登科记考》引作“处士”科(《登科记考补正》卷二〇,第837页)。

⑤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第99—100页。

为合适的应举者，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其目的。其结果是，它拥有极广泛的包容性，能更为弹性地应对它所面临的问题。

制举科目的这一特征和功用在乾封元年（666）幽素举的情形中有清晰的体现。这一年的制举，得第者十二人，其中王勃和苏瓌两人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王勃是因刘祥道巡行风俗得到荐举，时年才十四五，显然是正在习业的州县学生身份，甚至可能并未进官学。苏瓌则已经有过一任官职的仕宦中人，他是以在任官或待选的前资官的身份应举的，当时年约二十八^①。这次制举使王勃突然中止了正常的读书修业阶段，摆脱走常举一途必不可少的约束，提前步入仕途，而苏瓌则借此绕过待选的障碍，获得快速的升迁。

白衣与官吏都可应制举，是制举的一个重要特点，原无可怪之处。这里的关键还在于，王、苏两人身份全然不同，但“幽素”的名义却罔顾这个差异。他们都被视为幽素之士，即怀有某种才能或品德而未能见用于世的“幽人”。又如开元二年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及第的孙逖，其情形与王勃应“幽素”举正相类似^②。若要循名责实，这一名号显然并非据“实”而得。但是，在制举中发生的是相反的过程：是帝王赐予他们以幽素之名，从而将他们从常举和常选的按部就班中超拔出来，他们是幽素之士的“事实”正是在这一时刻产生的。帝王不但为自己的制举行为赋予“旌贲隐逸”的总名，宣布所荐送的举子都是有待征辟的隐逸之士，还特别设置了一部分其用语直接来自隐逸话语的科目，用这类科目进一步确认制举诏对士人的命名效力。制度设计的这一特征使得任何一个前来应举的士子都能合适地被视为某种程度的隐逸之士，或者是怀有某种具体明确的才能而隐，或者并不必指明，只要未入仕，就可以视为是怀才隐逸之士。也就是说，无论“事实”上其身份是多么驳杂，他们都是身沐皇恩或理应沐浴于皇恩之下的隐士，这是他们的共同身份。对士人而言，这是一个洋溢着浩荡皇恩的荣誉身份，没有理由不接受。

三

接受这一身份的重要表征，就是士人在叙述本阶层成员特定阶段的生活状态时，习惯于将它描述为某种隐逸生活。学界多已注意到唐人笔下的“隐逸”远不限于“真正”隐于山林的情形，诸如读书修业^③、罢任待选^④等，往往都视为“隐逸”。但对其原因则鲜有解释^⑤。事实上，这是士阶层将其成员

① 两《唐书》本传对苏瓌此段经历的记述颇为疏略。卢藏用《太子少傅苏瓌神道碑》稍详，但漏记乾封元年幽素举及第而获超迁一事。关于这一点，本文限于篇幅，无法详述考证过程，此处仅述结论（卢藏用文见《全唐文》卷二三八，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册，第2410页上）。

② 孙逖年十九应此科及第，此前正是一个正在读书修业的士人，他能获荐应制举，当与其年十五谒雍州长史崔日用，得其嗟赏有较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他是以文词受知，但应的却是“哲人奇士隐沦屠钓”，见出正被时论视为一个藏迹于市井之士（孙逖的生平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一册，第165页以下）。

③ 将读书修业视为隐逸，是唐代士人的普遍观念，史传中多有此类记载，诗人自己的诗文中也经常以类似的措辞叙述自己的经历。其例甚多，兹不备举。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详尽地考察了唐代士人读书山林寺院的情况，可参看，但严氏不同意将士人依于山林寺院读书视为隐逸，而且也不认可唐代士人自己的这种说法（见《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1年版）。这一意识对于诗歌创作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一文独到地指出了这一点（见《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特别提到守选与唐人“隐逸”之关系（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3—294页）。

⑤ 如上引赖瑞和指出：“唐代文学研究中常见的所谓‘仕’和‘隐’的问题，其实应当放在这种守选制度下来探讨，才有意义。……以地方官来说，他每做满一任，即需守选若干年，导致他不得不‘归隐’。……如果一个人一直没法选上下一任官，他甚至可能要长期‘被迫’归隐。”这还只是指出了将守选视为归隐这一现象，而没有解释为何将守选视为归隐。

描述为隐逸之士，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描述方式，从意识到具体用语，都完全是受制举的鼓励。这尤其表现在墓志对士人履历的叙述中。如孔珪历任诸外县簿、尉、丞三任，最后在潞州黎城县令任上考满罢归，志云：

居太丘而弘道，无忝仲弓；自彭泽而归来，有符元亮。确乎养素，澹然辞满，傲睨终古，优游卒岁。

以开元十一年六月十二日遘疾，终于延福坊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八。^①

孔一生共任四职，若非年逾不惑始解褐，则显然多经守选之期。他最后在黎城县令任上秩满而归，亦属于正常待选使然，但志文拟之以陶渊明辞彭泽令之事，将正常考满因而属被动居家描述成一种主动的退隐行为。值得注意的是，“确乎养素”与“幽素”、“养志丘园”等科目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正可见出这些科目确实是将应举的士子视为某种隐逸之士。李明远的墓志文更清晰地阐明了这种描述所蕴含的集体意识。李如意元年（692）丁忧，期间以孝闻，诏旌表闾里，并制授定王府国尉，志云：

非其所好，秩满客于洛阳，习隐者也。^②

他卒于开元八年（720），春秋六十有四。姑定他于服阙后赴职在695年，以一任职位的任期最长五年计，则辞满约在圣历、久视年间（700）。由此知他此后居家至去世，约有二十年之久。这二十年的生活，被志文作者称为“习隐”。把它与王维《积雨辋川庄作》诗中“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中“习静”一语相联系，其中消息不难窥知^③。

这些士人多久处卑位，正是制举所着意旌赏的重要对象。在制举诏中他们都是怀才未达之士，明主就要把他们从下位沉滞中拔举出来。墓志也往往透露出这些士人以“隐逸”之名等待再次为世所用。如王庭芝，长安四年（704）以宿卫考毕，调补锦州参军，随同本州刺史平寇有功，封上柱国：

既而秩满，家于洛阳，散诞丘园，优游情志。然宏材伫构，方启峻于干霄；而清露易晞，奄兴歌于流电。^④

志记其卒在开元七年（719），年仅四十四而卒，则王以一任之秩而罢时才三十五岁左右，居家约有九年。锦州为下州^⑤，州参军从九品下^⑥，为士人入流之最低品级。上柱国为流内正二品，是勋官的最高阶^⑦。他以最低微之职官，获酬最高之勋品，可见其颇有勇力，盛年赋闲而早卒，确属未尽其才力。故“散诞丘园，优游情志”实为待选谋出的饰语，“宏材伫构”云云则恰透露出此类士人企盼重展其才的衷曲。

事实上，这一类描述，正是要替他们久处下位或久选不调的遭遇作一定的讳饰。有的时候，人们甚至不明言士人考满而罢，只用极模糊的文句直接带过。如陆绍，生于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显庆四年（659）卒，年四十四。志称其“起家拜文德皇后挽郎，即拜韩王府兵曹参军事”，此为其解褐之官。此后志文中直接赞其人品才学，接下去再云：

不夷不惠，久忘健羨之心；非吏非隐，更得逍遥之性。何图神仙无术……^⑧

文德皇后崩于贞观十年（635）^⑨，同年徐王元嘉转封韩王^⑩，陆为王府兵曹参军当在此时，时年二十，

① 《孔珪（656—723）墓志》，《汇编》开元一六九。为求简便，以下直接以志主之名来称举为他所作的墓志文。

② 《李明远（657—720）墓志》，《汇编》开元一〇四。

③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卷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44页。按“习静”固非王维首用，但王诗用以表现山居隐逸生活，是前人诗未涉及者。

④ 《王庭芝（676—719）墓志》，《汇编》开元〇九一。

⑤ 《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第1622页。

⑥ 《唐六典》卷三〇，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47页。

⑦ 《通典》卷四〇，第1094页。

⑧ 《陆绍（616—659）墓志》，《汇编》垂拱〇五四。

⑨ 《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上》，第2166页。

⑩ 《旧唐书》卷六四《高祖二十二子传》，第2427页。

这一任满秩后至其离世当有二十年左右。志文连考满罢归都不着一语，径直将这二十年述为某种无可无不可的隐逸生活。田嵩的志文也与此类似，从记述他弱冠常举及第、授滕王府记室参军一职，直接跳到其晚岁过着“有方外之趣”的生活，而此一段生活为时达一甲子之久，较陆绍居家更为漫长^①。不难看出，这种有意的模糊叙述手法，正与前述制举中设置“幽素”、“高蹈丘园”这类有意泯灭举子身份差异的科目相同。

所以，墓志将士人被动赋闲的经历描述成主动追求的隐逸生活，与制举以“旌贲丘园”的总名和“高蹈丘园”等科目上的具名赋予士人隐士身份的做法有着显著的相通之处。鉴于传统政治体系中帝王的权威，认为墓志的做法是受制举的鼓励而不是相反，显然是更为可取的认识。帝王亲自招纳士人以直接调节选官制度，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已经成熟运行的日常行政系统中夺取部分权力，与设官分职的精神是有一定冲突的。这个时候，只有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强大道德力量的隐逸话语是他所能利用的最好资源。实际上，在已有常举和常选为士人规定了人生之路的情况下，只有先赋予他这一名号，才能使之获得比常举、常选之士更高一阶的地位，从而能名正言顺地以超越后者的便捷方式进入仕途或者快速升迁。制举的频繁举行，使许多士人拥有了这样的名号，为士人描述自己提供了最直接的话语资源及道德力量。

墓志文虽为长逝者而作，却无疑更是为在生者而作，反映的是士林的集体意识。当他们如此准确地应和诏书的措辞来描述自己时，无疑是在制造舆论，把自己塑造成符合制举标准的士人，使自己成为合格的备选对象。正是在制举话语模式的鼓励下，士人乐于把自己描述成隐逸之士，从而他们一生各个阶段和多种形态的生活就是隐逸生活。这种赋予和描述所造就的“隐士”群体和“隐逸”事实，连同该行为本身，都是唐代隐逸现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四

这样看来，虽然唐初士人的退隐之风在创设制举的过程中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制举很快就颠倒了这一层关系：它不再是对士林已有隐逸现象的事后追认，而是以预先命名的方式宣告某种隐逸事实的诞生，并因而使自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于它的反映物，更不是由它作为外部力量来驱使自己。显然，这是隐逸观念的一个重大变化。在思想意识领域发生的这一变化，可以说其兴也微，其积也渐。当时的士林浸润其中，既多能深刻感受并主动利用这一现象，但也不乏未能准确地认识它的人。这就不免产生观念冲突，导致对制举所塑造的社会现象产生认识上的误区。

赵璘就嘲讽过士人求“不求闻达”举。他认为既曰“不求”，便不当主动来求，须经推荐，否则就与僧道号称“文章大德”一样，都是“号欺聋俗”^②。但是在他之前的徐安贞早就在《对举嘉遁第判》中表示过反对这样看待此类现象。此判处理的案情是，严虚应嘉遁科举及第，选曹注拟官职，引来不满，于是选司以严虚“名乖实，贬第”。徐的判文云：

严虚草泽贤才，蒲轮辟命。玉台对命，既则登科；仙署縻禄，诚宜利用。抑同选调，诂曰非常。坐见沦塞，行招往诉。然则晦其迹也，事等凿坏；行其道焉，何论负鼎。谅出处之有异，岂名实之相乖。义在优贤，理无贬第。兴言举主，诚则知人。赏先茅之地，非无故实；夺闲田之禄，未之前闻。循彼功曹，以为直笔。^③

① 《田嵩（约 638—约 723）墓志》，《汇编》开元一五八。

② 赵璘《因话录》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4 页。

③ 徐安贞《对举嘉遁第判》，《全唐文》卷三〇五，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四册，第 3097 页下—3098 页上。徐安贞，两《唐书》本传称其一岁三应制举，中甲科，开元中为中书舍人。则此判至迟应在开元中期之前，因中书舍人正五品上，已不须试判。赵璘生活于开成、咸通间，年代在徐安贞之后。

无论是实有其事，还是悬拟之题，该判都极生动真切地反映了唐代制举的实施所带来的观念冲突。嘉遁者应制举获授职引起争议，这类事情成为试判的题目，正说明当时由制举所塑造的隐逸意识相当盛行，不免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这里徐安贞要做出一个相当困难的反驳。他无法否认严虚应举导致其出处状态发生了变化，如此一来，几乎就只能接受其对手的结论：严虚应制举这一由“处”到“出”的变化，使得他的“嘉遁”之“名”失去了其嘉遁之“实”（如果此前确实有这个“实”的话），因而这个“名”也就是虚的，也就是选司所谓的“名乖实”。这正是传统隐逸观念执实以定名的思维模式。因此若承认“岂名实之相乖”的反驳有其意义的话，就只能跳出这一模式，把徐的意思理解为：严虚以嘉遁之“名”来应举，这就确立了其嘉遁之“实”，这个“实”并不因其出处变化而相乖。这正是制举诏的思维。可以注意到，“草泽贤才，蒲轮辟命”，几乎就是完全照抄制举诏中的用语。

赵璘在隐逸问题上仍持传统名实观念，故不免有上述批评。这种批评是可以理解的。观念的发展变化，并不必然是新观念彻底取代旧观念，从而后者绝迹而前者获得独占地位。旧观念仍会有相当数量的信奉者，且新观念的盛行往往使之以其旧而愈加自视占有某种道德伦理上的高度。同样，来自旧观念的批评也不一定就对当代新观念的接受、新风气的盛行造成根本的阻碍，相反它更衬托出后者的盛行程度。著名的司马承祯讥卢藏用“终南捷径”之事，便是一个例子。这一批评是由司马承祯这个“真正”的隐士所提出，所以令卢藏用更直接感受到道德伦理上的压力。其实，它和赵璘的讥评一样，都应视为只是独立的个案，是两种观念交争的结果，但不能据此认为当时的舆论认为与卢类似的行为是“假隐”，更不宜简单地对此作贬抑性的价值判断^①。

但是今天看来，史传的叙述却强化了旧有观念的道德立场，给认识唐代隐逸问题带来更大的困扰，几乎掩盖了制举塑造隐逸风气和意识这一现象。从《新唐书·隐逸传》对唐代隐逸风气的评价可以看到这一点：

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虽然，各保其素，非托默于语、足崖壑而志城阙者也。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故哀可喜慕者类于篇。

史臣认为，能够进入《隐逸传》的唐代隐士并不多，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过是以诡禄仕的放利之徒。他们纵然确实“隐逸”过，但因为最终接受了征召，获得了禄位，所以原有之“名”不副其“实”，不能称为“隐士”。

史臣在这里持的正是最为传统、纯正的隐逸观念。它强调判定一个真正的隐士，要以士人是否真属有意退隐、以及是否拒绝征召为主要依据。只有符合这一标准的人才是名副其实的隐逸之士，才有其道德价值，才能进入一代正史之中。这种观念有其深远的传统，不能说不。然而，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如此纯粹的标准能在多大程度上贯彻下去，是大有疑问的。被史臣认可的隐士，最突出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多少不一地拒绝过征召。但是，这一拒绝之前的所作所为却颇为总杂，并非一开始就不慕荣利，一些士人的拒招也并不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有高尚之节，很难说完全符合史臣的标准。

如孟诜曾得睿宗征召，以年老固辞，后来河南尹毕构以为有古人风，署其所居曰子平里。“以年老固辞”有的时候确实是不欲从宦的托辞，但在孟诜的身上却是实情。孟曾举进士，历任凤阁舍人、台州司马、春官侍郎、同州刺史等内外官职。同州为上辅州，其刺史是从三品之位，孟致仕时已是约八十五岁的高龄。故其退居伊阳山，实是正常的官僚退休而已，初无特别的隐逸之愿。他之被召，是因睿宗在藩时他尝为侍读，即位后以旧恩召之，而且还可能有睿宗求长生的动机，因为据其本传，孟

^① 认真辨析起来，卢藏用之事与制举还是有差别的。卢去官隐居，往来终南、嵩、少，竟得征左拾遗。这是最传统的征辟隐士的情形，与制举要考试是不一样的。但这正说明当时的皇权的确是把他当作“真正”的隐士看待，并不以他的去官之隐为假隐，在这一点上则与制举相通，尽管人们可以争论说这是武后在笼络人心。

颇善摄生。所以很难说睿宗召他一定是出于视其为高尚之隐士以敦奖风俗^①。《旧唐书》本来将孟诜列入《方伎传》，《新唐书》始改入《隐逸传》。两《唐书》中类似的变化还不少。如贺知章从《旧唐书·文苑传》挪入《新唐书·隐逸传》；阳城则反之，从《旧唐书·隐逸传》改到《新唐书·卓行传》^②。一篇《隐逸传》当然不可能囊括所有“隐逸”士人，但两《唐书》间如此显著的名单变化，足可见有此类经历的士人，究当以何种名义跻身史传，是有可商榷之处的。

持有严格隐逸观念的史臣们因为观念先行，而与他为之述史的当代或前代社会情实有相当的隔膜。例如王友贞，因为他自长水县令任上罢归后三召不就，两《唐书》都列入《隐逸传》中。但实际上，王在获一宰之职前，浮沉下僚或长期待选几乎六十年，正相当于前举田嵩自滕王府记室参军任后居家的时间^③。与其根据他耄耋之年三召拜官不就而列其为高尚的隐士，不如确认他实际上是一个久淹不达之士，正符合制举要搜访的人选。可见，作为一代正史不可或缺的《隐逸传》中的隐逸士人，是一批在高度纯化的观念衡量下诞生的人群。排除了“高尚之节丧焉”的“假隐自名”者，由正统的史书撰述传统所认可的这一批“班班可述”、征而不至的隐士可以出现在任何一朝正史中，但必不能有力地解释唐代的隐逸之风。他们或足以备一代史志之格，却难以构成唐代社会隐逸现象的完整图景。

正史《隐逸传》撰述传统的最大不足，就是完全割裂了制举与隐逸之间的复杂关联。《新唐书》作者本来注意到制举在唐代政治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对它的概括甚至较常举还要准确清晰^④，而且提到制举有“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的科目。但是，这些“高蹈幽隐”者既然接受了征召和职位，就成了“在位”者，可以认可他们是“贤人”，但不再是高尚的隐士。史臣没有注意到诸如徐安贞的判词中所反映出来的新的意识：对许多士子而言，“高蹈幽隐”这一身份，正是在他们应帝王诏举的那一刻诞生的，因此在此之前就无所谓真隐与假隐的问题；或者说，它属于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无法在制举所促生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意识框架中来讨论它。

五

仍需要强调的是，制举是在皇权的主导下进行的，它的目的始终在于根据当时的需要，在既有的体制内对官僚制度进行适当的调节。这一点从根本上规定了制举与隐逸现象之间，是前者对后者的命名与塑造关系。这一最基本的关系模式，贯彻在近三百年的实施过程中，有力地培育了士林将自己描述为隐逸之士的意识，并保证了它的延续。同时，为更好地实现其根本目的，它又设定了考试程序，

① 《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第5599页。《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传》，第5101页。传称其神龙初致仕，至开元初年九十三卒，以神龙初为705年、开元初为713年计，则其致仕之时年约八十五。

② 《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传》，第5101页。

③ 据《旧唐书·隐逸传》，王友贞长安年历长水令，罢归田里。中宗在春宫，召为司议郎，不就。神龙初重召，拟太子中舍人，亦不至。玄宗在东宫时表请以礼征，不至，年九十余，开元四年，卒。《新唐书·隐逸传》谓卒年九十九，则王友贞生于618年。其为长水令时年已八十四（618—701，以其就任在长安元年计算，理由见下）。《新唐书》又谓王少为司经局正字，从九品下。若以年二十许为“少”，则他至年八十余始为长水令，中历约六十年，显然是久经考选，始获此职。其罢归后被尚在春宫时的中宗征召，只能是其罢长水令之后不久。因为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即继位，此前的长安年号共四年，以唐制官员四考得替即罢，不得替可再任一年推算，王不过恰好在长安元年到四年之内即满任而罢。长水是畿县，令秩为正六品上，王罢任后几无守选之期，故中宗拟召为司议郎，仍正六品上，并无擢阶。神龙初重召，拟太子中舍人，为正五品下，擢三阶，当以新登位，又以其年高而素有“君子之风”（两《唐书》中语），故加以殊恩，且依然如前为太子官属。故其从畿县令罢归，纯是正常考满待选之意；且以如此高龄罢归，其仕途实已无大望，乃自然退归，而非有意退隐。其屡谢征召，实亦与此有关。

④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第1169—1170页。《旧唐书》没有《选举志》。新《书》特设此志，见出史家的卓识，但志中对唐代常举的叙述颇显条理不清。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比较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见该书第23页以下）。

在命名一塑造这一高阶关系的格局之内，从具体践行的层面构建了自身与隐逸风气更为具体的互动关系，对自己所催生的这一意识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调节。尤其是有唐一代，各个阶段的具体社会情势有过复杂的变动，制举的具体实施也因而有明显的变化。正是在根据具体形势而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它与隐逸风气的特定关系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

通考现存记载，可以发现，到玄宗一朝止的唐前期制举最为频密，肃宗以下明显逊于前期，而文宗大和以降尤难得一见^①。前期高祖一朝已略见前述。太宗、武后与玄宗，大体可见出制举之实施皆本着拔举人材之根本目的，而又各有其具体针对性。因之对考试手段的运用也有差异，清晰地体现出考试是帝王操之在我的重要调节方式，它对士人隐逸意识的变化所能发挥的作用，也端系于此。概括地说，太宗有意以“旌责隐逸”的名义打破选官任人“循班序”、“因地”的旧习，为此甚至多次从应常举的士人中寻求支持。士人也赞同这一做法，并颂扬它取得很好的效果。贞观二十年张昌龄对策把隐逸不出视为“匹夫小节”，且认为“调任自可怡神，烹鲜足堪养性”^②。虽然其中谏词的成分居多，其说法本身也并非全新的观念，但依然可以反映出在频繁的制举下，士人的出处观念、价值准则与隋末唐初退隐的那批士人相比，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太宗也同时非常重视考试，曾经将州县举送的举子悉数退回，下令重举^③。

太宗之后的高宗、武后之世，制举日见频繁，科目亦极多。尤其是武后时期，在继续承担打破“门资擢授，或以勋阶莅职，莫计清浊，无选艺能”^④之现状这一任务的同时，因应革唐立周的政治目标，制举被有意地充分利用起来。此时的特点是科目多，举荐的规模往往很大，给予的荣誉也相当高^⑤，而考试不严，甚至徒有其名。由是取人之滥饱受诟病，所谓的“假隐自名”也首先出于对此时风气的概括。如上文所论，对此更适当的认识是，士人虽然确实在利用“隐逸”以沽利，但他们所能利用的“隐逸”，与其说是“真正”的隐逸行为，不如说是被皇权命名为隐逸的士人的生活。玄宗对武后时期明显过度利用制举的做法做了明显的调整。这一时期，制举的规模也不小，史称开元以后“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⑥。此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承平之世“学业增多”，导致仕进困难的问题日益突出^⑦。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学业增多导致仕进困难，玄宗更加强调整要考核应制举者的艺业，并且留下较太宗时次数更多的斥退不合格举人的记载^⑧。这无疑强化了士人对读书修业的重视，也更加鼓励了士人将自己的读书修业描述成具有隐逸的某种特征。有唐三百年，在诗文中将读书修业形容隐逸，正是盛唐时第一次表现得最为突出^⑨。

肃宗时某种程度上又面临与唐初类似的境遇。除了仍关注“老于郎署，滞于丘园”者，战乱导致官员流散急需补充，是制举一个更重要的理由^⑩；同时，为玄宗自蜀还京而特开的制举^⑪，则似乎预示着此后制举功用的变化。肃宗以下，触目可见是在各种情形的大赦中下诏举人，这与前期很不一样。

① 学界或认为大和二年后即不再制举，则似可商榷，检《登科记考》可知。

② 贞观元年与贞观二十年两次都以此策问进士，详《登科记考补正》相关年条。

③ 《登科记考补正》卷一，第25—27页。

④ 张柬之永昌元年对策第一道（《登科记考补正》卷三，第111页）。

⑤ 如张说应制举的情形。《大唐新语》卷八《文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7页。

⑥ 《通典》卷一五《选举三》，第357页。

⑦ 《登科记考补正》卷九，第378页。

⑧ 如开元十四年、十五年，天宝十载等，具见《登科记考补正》各年条。

⑨ 其实重视艺业、考核艺业一直是制举所强调不辍的。只是可能因为武后时的特殊阶段，使得将读书修业视为隐逸这一现象“延迟”到盛唐时始表现得明显起来。

⑩ 见至德二载四月敕（《登科记考补正》卷一〇，第393页）。

⑪ 至德二载十二月大赦制（《登科记考补正》卷一〇，第394页）。

如前所述，常举和常选按部就班，定期举行，因而某种程度上失去灵活应对社会情势的弹性，制举本是针对这一点而来的。后期制举的举行也日益变得常规化和可预期，意味着在帝王那里呈现某种疲态，它的活力远不如前期显著，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更趋单一。尤其是它多半托身于帝王的大赦场合，使得天子对于士人赐予殊恩的意味更为突出。在这些大赦诏的行文中，“高蹈不仕”、“隐居丘园”之科往往先单独列出，特别强调对他们要“以礼征送”、“备礼邀致”。如德宗兴元元年改元大赦诏：

浇薄之风，趋竞不息；幽栖之士，寂寞无闻。盖诚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隐居行义，晦迹丘园不求闻达者，委所在长吏具名闻奏，朕当备礼邀致。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言直谏……者，委常参官及所在长吏闻荐。^①

诏中并不像前期制举诏那样将前文所述两类科目并列平等地叙述，而是有差别地对待，“隐居行义，晦迹丘园”者较各种其他科目举人多获一项专门邀致的礼遇。前期也有类似优待，但不如后期突出且与大赦结合得如此紧密^②。

这种情形透露了后期制举角色的微妙变化。天宝三载玄宗曾明称：

朕惟熙庶绩，博访逸人，岂惟振拔滞淹，以期于大用，亦欲褒崇高尚，将敦于薄俗。虚伫之怀，兼在于此。其有高蹈不仕，遁跡丘园，远近知闻，未经应荐举者，委所在长官以礼征送。^③

这里强调，帝王博访逸人，不仅是为解决仕途中人的久淹不调问题，也还想要通过礼遇隐逸之士来劝奖风俗。它对制举和传统征隐两种行为所承担的任务作了明确的区分，但恰恰又极清晰地表明，制举的确是以前文所述方式对所拟举拔的士人进行命名。而此次专门征辟隐士，又暗含着如下信息：选拔士人长期被视为制举的根本目的，专门礼遇隐士则一般不是它的直接目的。玄宗在此着意强调“亦欲”、“兼在”，只是为他此次专门礼征隐逸之士提供一个合适的理由。因为这一次是游移在制举和传统的征辟隐士之间：制举一般并不特别优待“高蹈丘园”一科的举子；传统的征辟隐士则往往是针对特定对象，先拟定官职，特降纶旨，专使征拜，以示对高尚之士的尊宠。这道诏书反映了在唐朝前期，皇权通过制举有效、自信地从整体上掌握着士林的心理需求。后期大赦诏中特意声明格外礼送这一类士子，则说明此类士子处于特殊的境遇，需要给予如此特别的待遇，以安抚他们。贞元十一年就的确实行了一次^④。

由此可见，后期的制举更突出地承担了传统征隐对士林隐逸风气所起到的效用。从这一制度自身来说，向这一步倾斜，是相当自然的。它与传统的征隐有关键的差别，但又都是直接由帝王下诏实施，体现了帝王的恩泽与权威。这一点使帝王便于采用征隐的相关话语来润色自己的制举行为，从而使之有了合乎伦理的依据；反之，帝王在需要时也可以很便利地在制举中纳入对隐逸之士的特别礼遇。僖宗光启元年大赦诏，是晚唐较少有的一次广列科目之制举。它清晰地表明在后期的艰难时世中，帝王动用全部资源力求振作的苦心。诏书略云：

朕每念艰难之本……盖搜扬之未至……其有文苞经纬，道冠儒元，贞遁自肥，浮名不染……今委使臣，远近征访，必行备礼，以耸群芳。且……时属多虞，非拔奇而不振，或有才优将略……并委使臣榜示访求，长吏津置发遣。……其间儒学优游，军谋弘远，密陈时务，愿应制举者，已从别敕处分。^⑤

诏中对所求之人分为三段述及。末尾“愿应制举”一语，说明前面按诸科所举之人不须考试。一“愿”字透露了帝王的隐秘心理：他仍期待有士人能重视制举获得出身这条道路。由此说来，第一段为诱奖

① 《登科记考补正》卷一一，第490页。

② 如开元二十七年正、二月两次礼征不求闻达者，第一次就不属大赦之例（《登科记考补正》卷八，第333页）。

③ 《登科记考补正》卷九，第351页。

④ 贞元十一年三月，诸州准例举荐隐居丘园不求闻达蔡广成等九人，各授试官，各给公乘，到京日量才叙用（《登科记考补正》卷一四，第581页）。先授试官并给公乘，非常接近传统征隐的做法（差别在于先授予的是试官）。

⑤ 《登科记考补正》卷二三，第990页。

风俗而征辟隐士时“必行备礼”所给予的荣誉，也终究还是不如应制举更符合帝王之愿望。然而乱世急于用人，又不得不殊恩招徕。此次制举应未能施行，但依然真切地反映了历史实情。在唐人眼中，甚至三百年间值得提及的偶尔几次“岩穴诏”，也都发生在后期。黄滔曾抱怨“大唐有进士举，无岩穴诏”（黄滔《祭崔补阙》，《全唐文》卷八二六，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九册，第8708页）。在他看来，值得一提的，主要是元和以来的阳城、卢全，再加上他所祭悼的崔道融等几个事例。这虽不免有祭文作法方面的考虑，但也仍能反映部分唐人的认识。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后期帝王试图借助征辟隐逸以振颓纲的反映。后期在对臣民分类施恩的大赦中颁布制举科目时，特意强调对隐逸之士的礼遇，这实际上更明显地反映了帝王在整体局势的把握上力不从心，从而需要遵行此类故事特示光宠。形态更为传统的隐逸风气和意识重新获得较多的履践，或者说更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与后期帝王日渐放弃制举，造成它对士林隐逸意识的影响日渐式微不无关系。

〔作者简介〕查正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发表过论文《暮归的诗学：孟浩然的诗艺习得及其超越》等。

《文学遗产》网络版创刊

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文学遗产》网络版现已正式创刊。域名为：<http://wxyc.literature.org.cn> 或 <http://www.文学遗产.中国>（请使用IE7.0以上版本）。

《文学遗产》网络版主要栏目有“论文选萃”、“新作首刊”、“前沿探索”、“名家学境”、“学术随笔”、“域外汉学”、“新书推介”、“学术信息”等，力求充分利用网络空间，综合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媒介手段，为读者提供更加直观、更加丰富的阅读服务。

“论文选萃”刊发本刊和其他刊物已经发表过的古典文学研究优秀论文。“新作首刊”则主要从来稿中选择那些文字较长，或资料性较强的文章在网络版刊出，尤其注意推出新人新作，并定期在纸质版上做综述介绍。“前沿探索”主要刊载一些具有学科探索和前沿意义的文章。“名家学境”分为名家讲座和名家访谈两类，领略名家风采，借鉴名家经验。“学术随笔”主要刊载学术随感、札记等，力求小中见大，言之有物。“域外汉学”包括海外学者访谈或海外汉学研究等。“新书推介”主要介绍各专业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文史研究著作。“学术信息”报道在国内外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学术会议信息。

《文学遗产》网络版是《文学遗产》学术品质的延伸，又是《文学遗产》学术空间的扩容。它将秉承本刊一贯的严谨求实的学术传统，根据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逐步调整和丰富现有的栏目设置，充分利用网络介质的独特优势，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面貌、状况，清晰、全面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文学遗产》网络版与纸质版双向互动、相辅相成。作者在网络版首发的研究成果，本刊将定期在纸质版上综述，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作者在纸质版刊发的学术成果，在网络版上也将有选择地予以推荐，进一步扩大其学术影响。

《文学遗产》网络版是《文学遗产》编辑部与学术界沟通的“快捷键”。它将在条件具备时，与读者实时互动，以便直接地获取学术界的反馈信息，加强与研究者的联系与交流，使本刊纸质版和网络版的学术质量不断提升。

殷切期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关心、呵护《文学遗产》网络版的建设，使她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平台。

《文学遗产》编辑部